

本书出版由黑龙江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明代历史探赜

胡 凡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历史探赜/胡凡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000-8385-6

I. ①明… II. ①胡… III. ①中国—古代史—明代—研究

IV. ①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3752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朱杰军

责任印制 张新民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8385-6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一

胡凡教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早在大学读书期间，即对明清史发生了兴趣，1982年毕业以后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其中明史是他的主攻方向之一。近三十年的潜心求索，勤奋耕耘，他的明史研究结下累累硕果，《明代历史探赜》乃其治明史的心血结晶。

该书由二十二篇文章组成，分为四个部分：明代政治史研究；明代宫廷史研究；明代北部边防研究；明代中央朝廷与蒙古族的关系研究。综观全书，这四个部分之间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内在的联系；所论问题，或开拓领域、填补空缺，或转换视角、提出创见，反映出作者对明代历史发展的深刻理解和宽广把握。

在第一部分明代政治史研究中，他不像传统政治史研究那样，把目光放在政治制度、英雄人物上，而是独辟蹊径，选择了铨政史、立储之争、东宫臣僚集团、佞幸以及嘉靖御倭战争中的将帅集团作为研究对象，确有独到之处。以铨政史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还较少有人注意这个问题，他的研究可谓领潮流之先；对明代立储之争的分析，可以使我们看到明代历史演变的各种动因与多种势力的角逐，而在太子周围形成的臣僚集团，则成为新一代统治机构的核心，对新朝政治起着重大的影响，这无疑抓住了封建时代政治节律的关节点。对明代佞幸干政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于封建政治认识的深化；

对嘉靖抗倭斗争中形成的将帅集团的考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在反抗外来侵略中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

第二部分的明代宫廷史研究弥补了相关研究的缺欠。他较早注意到了宫廷史，对明代的宫廷教育、选秀女制度、明代皇帝的家庭和宫廷生活以及嘉靖皇帝与太后及皇后的关系作了探讨，很有见地。在明清两朝的宫廷史研究方面，清代宫廷史的研究成果较多，明代宫廷史研究相对薄弱，胡凡教授的研究也就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第三部分明代北部边防研究是胡凡同志对明史研究的独特之处，这里既有对明代前期北部边防的整体论述，又有对明代九边军镇的个案分析，还探讨了明穆宗即位后对北部边防的整顿，视野非常广阔。其中《明代洪武永乐时期北边军镇建置考》、《明代九边蓟镇形成考论》、《明代九边延绥镇形成考论》三篇考据性的文章对明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他认为：明代后来的九边军镇，就是洪武时期都司级军镇的继承和卫级军镇的升格，洪武时期的七镇演变到永乐时期的八镇，既和蒙古族形势的变化有关，也受明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制约。对于明代九边重镇蓟镇形成的时间，他确定是在朱棣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后的当年年底、即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的十二月，而其所以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是和靖难之役有关，二是和成祖朱棣即位后对北边防卫的设计有关。对于九边延绥镇的形成时间，他认为形成于明英宗正统前十年，其原因则是蒙古族进入河套以后，对明朝形成三面威胁，于是有延绥镇的设立，由此也使明代的九边就此定型。这些研究都发前人所未发，而且能够使我们认识到《明史·兵志三》某些记载的错误和不足，对于促进明史研究的深入有重要意义。

第四部分明代中央朝廷与蒙古族关系的研究集中在明代中叶，即从明英宗时期到明穆宗时期，这正是以往明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关于明代英宗时期明蒙之间的朝贡体制，他认为这是明代在继承前代基础上于制度文化方面的一项创造，明廷与蒙古族之间交流的物品，不能简单视为一般产品或经济交流，它包含着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内涵。在这种双边交流中，明朝政府对蒙古族各部首领政治上的吸

引、安抚和笼络，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明廷赐给朝贡使臣官爵，使他们成为明朝职官，代表朝廷实现对边疆地区的统治，这对增强蒙古族对明朝廷的向心力有重要意义。明代中叶的北部边防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随着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套寇”成为明朝政府的心腹之患。为了防备蒙古族的袭扰，明王朝在北边既部署有正兵，又有奇兵，再有游兵，分地设防，往来策应，消耗了相当大的财力和物力，明廷内部亦屡有“搜套”、“复套”、“筑墙”之争，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考察和研究，对于补充明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大有裨益。而他对于明穆宗时期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的分析更是独具慧眼，认为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之间正常交流的要求是“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历史和经济条件；明穆宗即位后明朝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是“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决定性条件；而明朝的边吏识大体、顾大局、妥善处理把汉那吉降明事件则是“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直接条件；同时，隆庆皇帝对北部边防的整顿在促成明廷和蒙古族之间关系的转变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对明朝政治形势变化的分析中，他对明穆宗较少民族偏见的认识，对穆宗和阁臣之间相互信任、内阁重臣颇有才干、正处于明代历史上君臣相协的最好时期的判断，切中时代脉搏，也加深了我们对明穆宗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

岁月如流，我和胡凡教授相识已经二十年。我们都是明史研究的痴迷者。他不仅学养深厚，思维敏捷，而且热情豪放，多才多艺。与他相处，每每会感受到他散发出的黑土文化的醇香。在中国明史学会的集会上，研讨学术，阐发宏论之余，他每每引吭高歌，给同仁们带来美的享受和欢乐。他的新著即将付梓面世，来电向我索序，却之不恭，勉强应命，就此附骥攀鸿，亦我之幸。

是为序。

张显清

2009年7月1日

序 二

胡凡教授的《明代历史探赜》，总共四编，分别就明代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探赜索隐，内容丰富，论述精彩，重视继承，努力创新，拜读之后收获甚多。

第一编《明代政治史研究》。内容有：洪武时期铨政史论、明代的立储之争及其后果、东宫官僚集团与明代政局变动、佞幸的构成与社会影响，以及嘉靖御倭战争胜利与明朝的将帅集团。这些都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虽然已有很多成果问世，但仍有不少问题需要继续研讨。本书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是补其不足或空白，对明廷最高决策集团内部斗争形势的分析比较深透。尤其是东宫集团与佞幸两个问题，以往相对缺乏系统研究。本书于前者，全面叙述了东宫集团的组织机构、权责与地位，认为“其作用有如影子内阁，在皇位更替时，往往成为新一代统治机构的核心，对新朝政治起着重大的影响”。对于后者，书中勾勒了明代佞幸的身份构成及其干政的种种手段，研求了产生佞幸干政的历史根源。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详细论列了佞幸干政对一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第二编《明代宫廷史研究》。主要有：总论有明一代的宫廷教育、选取民间秀女之制、畸形的明代宫廷社会、明代皇帝的家庭与帝位传承等。这类选题前沿，是时下明史研究的热点。本卷最大的亮点，是有别于传统思维模式，以政治文化和社会性别的全新视角，展现明代

宫廷文化生活的多样与怪异，剖析其特点与作用。其间最令读者品味的至少有三点：一是特别强调宫廷教育对于皇太子承业治国的重要意义；二是将宦官教育纳入宫廷教育范畴。过去史家们常常把宦官读书识字视为其作奸的缘由，本书以为这是一种偏见。其实宦官善恶与其读书宫中，“并无绝对联系”；三是对宦官与宫女精神生活关系的定性可谓新颖。本书认为选拔民间秀女之制从一开始就是对民众权利的一种蔑视。民女入宫，成为宫婢。宫婢与宦官都属于特殊群体。宦官的特殊生理与宫婢的凄凉处境，生发出他们情感上的互动关系，形成“传统宫廷中特有的一种文化圈”——“宦官与宫婢生活圈”。

第三编《明代北部边防研究》。内容为：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永乐朝北边防线的变化；洪、永二朝北边军镇的置立；明代蓟（镇）与延绥（镇）二镇形成之研究；隆庆皇帝对北部边防的整顿。这些是明代军事史与边疆史研究的重点之所在。明王朝的边患为“南倭北虏”。“南倭”之祸，是大肆抢掠烧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农工生产，妨碍对外贸易。“北虏”之犯，则是直接威胁国家政权，事关王朝存亡。因此，北部边防始终被列为军国要务，“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以至“天子守边”。于是也成为治明史者历来相当关注的课题。本书于此所论多有新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全局上，对洪武时北部边防政策的制定——永乐朝的调整——隆庆中的整顿诸重大决策出台背景、核心内容、实施经过及其效应的论述，比往昔更深入，评价更切合实际；在细节上，对明初北部军镇数额、九边形成过程、蓟与延绥二镇称镇时间之起始等若干具体史事的考证，更具有说服力。

第四编《明代与蒙古族的关系研究》。由《明英宗时期的明蒙朝贡体制与农牧文化交流》、《明穆宗时期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等六篇论文组成。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各族之间曾经有过矛盾、冲突，甚至互动干戈，但其本质和主流则是各族人民世代友好相处，和谐团结，互相帮助，共谋发展。本书在这方面最有吸引力的，当在于运用大量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印证这种友好关系。书中写道：明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朝

贡贸易，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双边经济文化交流，是“互通有无，互相补充”，“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是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两大体系之间互补型的交流关系”。就英宗时期而言，这种交流也没有因为土木之变而中断，“它既未影响明蒙双边交流的顺利进行，也未破坏朝贡体制的正常运转”。这些话语见底很高，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读来深受启发。书中对隆庆朝“俺答封贡”局面出现的政治思想基础、经济条件和历史根源的分析，有超越前人之处；对实现明蒙和好的当事人的评价客观公正，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

胡凡先生治学刻苦用功，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不断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身为黑龙江大学历史学科带头人，他教、研结合，互为促进，相得益彰。既胜任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又勤奋研治明史以及清史、东北地方史、中国文化史，先后出版各类专著十余部、论文百余篇。可喜可贺。相信他今后一定会为广大读者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

是为序。

林金树

2009年7月18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 录

第一编 明代政治史研究	1
明代洪武时期铨政史述略	2
一、铨部沿革	2
二、官吏的选用	5
三、官吏的考核	10
立储之争与明代政治	16
明代东宫臣僚集团与明代政治	28
明代的佞幸与明代政治	42
嘉靖御倭战争胜利与明朝的将帅集团	53
第二编 明代宫廷史研究	65
明代的宫廷教育	66
一、皇帝自身的教育	66
二、皇太子的教育	70
三、其他与结语	72
明代的选秀女之制	75
畸形的明代宫廷社会	91
一、宦官与宫婢生活圈	91
二、趋向没落的皇室贵族生活	103

明代皇帝的家庭与帝位传承	116
明世宗与宫中太后及皇后关系述略	119
一、刻意抬高蒋太后地位	119
二、打压张太后及张氏家族	122
三、三位皇后未得善终	126
第三编 明代北部边防研究	133
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	134
一、迁徙山后之民进入内地以造成与蒙古交界的 无人地带	135
二、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	136
三、为解决边防驻军的供饷而形成边防屯田 与开中法	140
四、巡边与防秋制度的形成	142
五、边墙堡寨的修筑与诸王防边	144
明代永乐时期北边防线的变化	147
一、朱棣为燕王时在北边防务中的作用	147
二、明朝与东西蒙古之间的互相利用与永乐皇帝 的五出漠北	151
三、北边防线的南撤与迁都北京 天子亲自担负起 防边的重任	157
明代洪武永乐时期北边军镇建置考	162
明代九边蓟镇形成考论	181
明代九边延绥镇形成考论	198
明穆宗对北部边防的整顿	215
第四编 明廷与蒙古族的关系研究	231
明英宗时期的明蒙朝贡体制与农牧文化交流	232
一、明廷和蒙古族间的朝贡体制	234
二、明英宗时期朝贡体制的全面展开	236
三、朝贡体制下明廷对蒙古族的政治吸引	254

四、明蒙朝贡体制所反映的几个特点	264
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	268
明代成化年间的“搜套”之举	283
明代成化时期对河套蒙古的防御措施	297
明代弘治、正德时期对蒙古族的防御	306
一、关于弘治年间复套的议论	306
二、正德年间关于复套问题的议论	312
三、关于弘治、正德时期筑墙防守的情况	317
四、弘治年间的捣巢与正德皇帝的应州之战	322
明穆宗时期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	329
后 记	343

第一编 明代政治史研究

明代洪武时期铨政史述略

铨者，选官也。《中文大辞典》曰：“量才授官曰铨。”《辞海》亦然。故铨政，即指选用、考核、黜陟官吏的各种制度而言。明太祖朱元璋起自民间，对元末吏治腐败、官吏蠹政害民之事深恶痛绝。十五年而成帝业，在位三十一年间，每于官吏的选拔、任用、考核，孜孜讲求，“夙夜兢业，以图天下之安”^①。正因为朱元璋十分重视官吏的选任与考核，加强对官僚队伍的管理，扭转了元末以来官吏贪鄙、漠视民间疾苦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为明代前期开创了良好的社会风尚，造成了封建史家所赞誉的“洪武之治”，也为明代前期的发展、强盛奠定了基础。兹就洪武时期之铨政事宜，略述如下。

一、铨部沿革

明朝初起，沿袭元制，置中书省总理政务，设左、右丞相等官，下属有四个部，分理钱谷、礼仪、刑名、营造等各项事务。地方上设各行中书省。洪武元年始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仍然隶属于中书省。所以朱元璋说：“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至为要职。”^② 其中吏部总管

^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2，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34，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条。

选官（人事调配）之事，又称铨部或铨曹，权力“视五部为特重”。洪武五年确定六部职掌，“岁终考绩以行黜陟”，吏部掌管天下官吏选法、封勋、考课之政，属下有三部：总部掌文选，司勋掌官制，考功掌考核。所以朱元璋说：“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由吏部。”^①洪武六年定制，每部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十三年正月废丞相，“罢中书省，升六部”，二月定六部官制，“吏部尚书、侍郎各一人，总掌天下官吏铨选、勋封、考课之政令”^②。其属有四部：总部掌天下文选、吏役及开设、革并衙门等事务，司封掌天下封爵，凡封赠、诰敕、承袭、礼仪、印信等事务，司勋掌天下文职勋级、月俸、升转资格、品级、官制、贴黄等事务，考功掌天下官吏之考课，凡朝觐、任满给由、起复官吏、考其功过、别其善最、奏请黜陟等事务。洪武二十二年更改六部所属总部的名称，吏部的总部称为选部。二十九年又改六部诸属部为清吏司，“上以六部之属皆称部，混而无别，故欲易其名，……凡属部皆曰清吏司，……吏部选部曰文选司，封部曰验封司，勋部曰积勋”^③，考功仍旧。吏部机构由此确定下来。

至于官吏的任用，《明史·选举志》载：“任官之事，文归吏部，武归兵部，而吏部职掌尤重。”但洪武时官吏的选任与考核，最初并不完全由吏部，而是由中书省掌握。如甲辰年（1364）十一月，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说：“立国之初，致贤为急，中书百司纲领，总率群属，须采择贤者与之共理。”^④丙午年（1366）三月，命中书省严选举之禁。洪武元年六部的官制系由中书省奏定，“天下征至贤良官吏，中书省量才授任。”自洪武元年设六部至十三年罢中书省这段时期，因吏部尚书隶属于中书省，一切铨政当是由吏部具体经划，通过省台奏明皇帝裁处的。史载“镇江滕毅首长吏部，佐省台裁定铨除考课诸法略具。”^⑤然据《实录》所载，此时吏部已将一切铨政事宜承担起来了。如洪武

① 《明太祖实录》卷 65，洪武四年五月丁巳条。

② 《明太祖实录》卷 130，洪武十三年二月戊申条。

③ 《明太祖实录》卷 246，洪武二十九年五月庚戌条。

④ 《明太祖实录》卷 34，甲辰年十一月辛酉条。

⑤ 《明史》卷 138《陈修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963 页。

二年八月，“命吏部定内侍诸官制”，“诏府州县正官三年一考课，于吏部核其贤否而黜陟之。”三年十二月，“吏部言：守令职主牧民，宜久其任。”四年闰三月，“命吏部定内监等官品秩”^①，等等，足以说明此时吏部的地位和作用。洪武十三年以后，罢中书省，废丞相，升六部尚书为正二品，权归六部，由六部为皇帝“总理庶务”，吏部尚书“掌天下官吏选授、封勋、考课之政令，……表率百僚，进退庶官”，位居“铨衡重地”，因此吏部成为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此后，量能授官、随器任使，核功过以定黜陟，都由吏部主持，诚如赵翼所说“中书省革，部权乃专，而铨部尤要。”^②

太祖一朝，自洪武元年设六部至三十一年，先后任吏部尚书的有滕毅、陈修、詹同及子詹徽、李信、余焮、翟善、杜泽等共36人，除詹同詹徽父子外，其余多不久任。任侍郎的共有25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陈修、李信、余焮、翟善、杜泽等人。史载陈修任吏部尚书，“与侍郎李仁详考旧典，参以时宜，按地冲僻为设官繁简。凡庶司黜陟及课功核实之法，皆精心筹划，铨法秩然。”此外，“令人覲官各举所知，定内外封赠荫叙之典，自浮山李信始。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迹文册图画土地人民以进，及拨用吏员法，自昆山余焮始。仿《唐六典》，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诸司设官分职，编集为书曰《诸司职掌》，定吏役考满给由法以为司、卫、府、县首领，选监生能文章者兼除州县官及学正、教谕，自泰兴翟善始。三年一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泽始。此洪武时铨政大略也。”^③这里也只给人们一个大略，究竟铨政具体如何，尚待探究。这里仅就文职官吏的铨法作一勾稽爬梳，至于武选，限于篇幅，只好阙如了。

二、官吏的选用

洪武时期官吏的选用，按《明史·选举志》载，是所谓“进士、

^① 《明太祖实录》卷65，洪武四年闰三月乙丑条。

^② 《廿二史劄记校证》卷33，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70页。

^③ 《明史》卷138《陈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64页。

举贡、杂流三途并用”，尤其荐举，在洪武时期特别盛行。所以顾炎武说明初三途并用是“荐举一途也，进士、监生一途也，吏员一途也。”^①这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仅分述如下。

荐举。明太祖起兵以后，惩元代“纪纲不振，至于土崩瓦解”之弊，认识到以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治理天下的，“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所以他经常与臣下讨论用人之道，其中心就是“求贤”，要访求天下贤才与其共理国政，以图至治。遍检史乘，其求贤若渴之心，访求贤才以供任使之事，史不绝书。《明史·选举志》载：“甲辰三月敕中书省曰：‘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犖奇伟之才，世岂无之。……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或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诣阙面陈其事。郡县官年五十五以上者，虽练达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选民间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书，与年老者参用之。十年以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于是州县岁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间及兼通书律者。”这对于解决明初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而又官司乏人的局面，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国家初立，从朝廷到地方，从省、府、部、院、寺、监到府、州、县，各级官吏所需人数不啻数万，为建立这一庞大的官僚机构，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明太祖不断地发布求贤诏令、派使臣分行天下访求贤才、令有司察举、保举、令郡县贡士，等等，以求有足够的官吏来源。如吴元年（1367）遣起居注吴林、魏观“求遗贤于四方”，又令侍臣“各举贤良，以资任用”，洪武元年（1368）九月下求贤诏，继而又遣使臣“分行天下，访求贤才”。这一时期征来的贤才，由中书省量才授任，并且不分蒙古、色目人，一视同仁，凡“有才能者一体擢用”，（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太祖实录》）还给赐道里之费，以养其廉。此后荐举之令屡下，洪武三年五月，“诏天下守令询举有学识笃行之士礼送京师”；六年二月停科举，“诏令有

^① 引自《明会要》卷48。

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四月“命吏部访求贤才于天下”。其荐举之名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有儒士、秀才、人才、耆民以及文学、孝廉等等。十五年，又“命天下朝觐官各举所知一人”，到九月，州县举荐之人多达 3700 余人，有的儒士径授以布政使、参政、参议等官。十八年十一月，“诏举孝廉之士”。二十一年八月，“命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官各举文学干济之士”。二十二年八月，“诏天下府、州、县各举年高有德、识达时务、言貌相称，年五十以上者一人”。二十三年六月，“命吏部选天下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授以官，凡四百五十二人。”这一年所选天下耆民可任用的共有 1916 人。

明初除了荐举任官以外，还有选取补吏者。如洪武十九年八月，“命吏部选取直隶应天诸府、州、县富民子弟赴京补吏，于是与选者凡千四百六十人。”《明会典》载：“凡僉充吏役，例于农民身家无过、年三十以下能书者选用。”可资印证。官是有品级的，分为九品十八级，而吏则是在官府衙门中承担差役的，其地位低下，所以国子学生违犯学规，就“有罚充吏者”。但政府一些具体的事务却都是经他们之手去办的。

洪武时期荐举的面非常广，朝廷内外、大小臣民皆得推举，就连仓、库、司、局等杂流吏役，也可以荐举文学才干之士，所以“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①。荐举授官者最多时达 3700 余人，少时也有 1900 余人，这样就保证了明王朝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进士、监生。进士和国子监生在洪武时期也是官吏的一个主要来源。明初，吴元年令开文武二科取士，夏燮谓其“草创之初，设官需才，故其时仅就东南人士……试之于廷”^②，并颁布了科举取士之式。洪武三年八月，开乡试科取士，据《实录》数字统计，直隶及十一行省定额为五百二十人，王世贞案：洪武三年庚戌始开科，就式者乡举

① 《明史》卷 71《选举三》，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712 页。

② 《明通鉴》前编卷 4，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42 页。